



西方媒體為什麼炒作「立場新聞案」？

新聞背後

梅若林

兩名前「立場新聞」編輯日前被裁定「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外國一些反華媒體又急不及待要跳出來刷存在感。首當其衝的便是「老熟人」《華爾街日報》，用斷章取義的方式指稱二人罪成是因為發布了「政府不喜歡的內容」。《華爾街日報》自己在敏感議題上從不敢逆美國政府意，現在倒好意思批評特區政府打壓新聞自由？這論本案與新聞自由根本毫不相干，《華爾街日報》自己對案情一知半解就想充當「教師爺」，一缺報格、二無專業，有何資格教香港新聞自由？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用「香港兩名編輯被判有罪」(Hong Kong Convicts Two Editors)為題，可以說相當有「標題黨」的意味。不解釋基本背景，只單方面強調「編輯」和「有罪」兩組詞語，明顯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把讀者帶向特區政府打壓新聞工作者的方向去。其後在文章中，更稱兩名前「立場新聞」編輯被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是因為「立

場」發布了政府不喜歡的內容」。

煽動仇恨絕非新聞自由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華爾街日報》刊出相關文章後，便迅速去信反駁以正視聽，指出《立場新聞》的意識形態是排斥中國的地方主義，甚至成為抹黑和詆毀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工具。相關文章在沒有任何客觀依據的情況下，攻擊香港國安法和相關執法及起訴程序、通過虛假信息傳播仇恨和反政府情緒；攻擊警方的執法、美化暴徒的行為——換言之，就是並非建基於事實。

本案涉及的文章中有11篇被裁定具煽動意圖，這些文章的內容並不是單純的「評論」或「報道」，而是帶有明顯目的，引導讀者破壞憲制秩序，以至長時間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進行「抗爭」：例如其中一篇羅冠聰所寫的博客文章，指導讀者低調以「非政治」組織聯絡、隱藏及蔓延開去，煽動香港市民做好準備隨時再行動，削弱中央管治以及擴闊對其戰線；其另一篇文章亦在煽動讀者的「烈士情

緒」，聲稱承受代價是社會運動的本質之一，鼓勵讀者不顧後果地挑戰政府及中央管治；又稱抗爭者被無理打壓、被失蹤、侵犯、長年囚禁等，以假消息散播憎恨及反政府情緒，煽動支持者全面進行曠日持久的抗爭。又比如何桂藍的一篇專訪，極力說服不同意或還未同意「攞炒」手段的讀者，是因為他們「還未察覺自己只是生活在極權之下」，試圖製造恐懼，令讀者相信香港完全沒有自由、無法正常生活。

這些算是正常新聞報道或評論嗎？至少可以肯定，《華爾街日報》一定不會，亦不敢刊登煽動衝擊國會議員的文章。以至幾個月前美國大學發生的反駁示威，《華爾街日報》怎麼從不發布支持學生、反對州警暴力清場這類「政府不喜歡的內容」？當然是因為其心知肚明，新聞自由並非絕對。歐洲人權法院對新聞自由的判例，亦指出即使是報道涉及備受公眾關注的重要議題，也不享有完全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就在不久前，英國一名記者亦因涉嫌違反英國《恐怖主義法》而被捕。《立場》的問題在於其既不中立也不

客觀，只是打着「民主人權」的旗號，肆意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煽動社會無止盡的仇恨，完全違反傳媒行業須以準確事實為基礎、提供準確可靠資訊的最高原則。因此，「立法新聞案」與新聞自由根本沒有點關係，如果打擊假新聞、假資訊都算打壓新聞自由的話，那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擁有新聞自由。

香港真實的新聞自由狀況究竟如何？從數據上，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本地、內地和海外傳媒機構的註冊數量不減反增；在法律上，特區政府也沒從禁止過任何人、任何媒體批評政府，這不單在《刑事罪行條例》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作出了保障，列明指出政府措施、憲制、法例或司法上的錯誤，目的在於矯正錯誤或缺點，並不構成煽動意圖。

特區政府不會被「制裁」嚇倒

在最近一些政策議題上，比如垃圾收費、性教育教材，不管是媒體還是社會各界都不乏強烈的反對意見。箇中區別，在於《立場》的文章並非基於事實作出的評

論或批評，而是單方面的抹黑和詆毀；反對垃圾收費、性教育教材等政策，則是在客觀理性的基礎上自由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

《華爾街日報》用「香港兩名編輯被判有罪」作為文章的題目，想把新聞工作者等同成「免罪金牌」，也只能騙騙那些不知底裏的人。其文章提出對香港實施的所謂「制裁」，更是徹頭徹尾的恐嚇，不僅有狐假虎威之嫌，且報格盡失。就如鄧炳強所說，這是卑鄙的政治操縱，特區政府不會容忍散播虛假信息和煽動仇恨，更不會被所謂「制裁」嚇倒，會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

《華爾街日報》在所謂「新聞自由」問題上持雙重標準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若然真關心香港的新聞自由，《華爾街日報》為何到現在還不交代自己早前炒記協主席一事？說到尾，一些反華媒體和西方政客不過將「新聞自由」當作政治工具，以圖為反中亂港組織巧言開脫，肆意抹黑香港，才能達到他們干預香港法治的目的。

美英抹黑香港法治的赤裸雙標



以法論事 江樂士

曾幾何時，大英帝國憑着其軍事實力征服全球，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大英帝國在其統領的土地上頒布一系列嚴厲法律，當中的煽動罪在大英帝國沒落後仍在許多前殖民地繼續沿用至今。

例如，在1870年，英國把煽動罪納入《印度刑法典》，規定意圖煽動仇恨、蔑視或敵對政府情緒，即屬違法，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印度1947年獨立後，煽動罪也沿襲成規。事實上，印度在現任總理莫迪的領導下，煽動罪的案例增加了28%，而自2014年以來，印度當局已提出了逾500宗煽動罪起訴，當中有149人因為對莫迪發表不敬言論而被檢控。然而，英國外交部、政界人士或歐盟未有因此對印度口誅筆伐。

又譬如，在1948年，英國因馬來西亞頒布煽動罪，用作打擊仇視、蔑視或敵對政府言論，以及挑起種族仇恨的言論。馬來西亞於1957年獨立後，煽動罪依然沿用至今。

8月27日，馬來西亞前總理慕尤丁被當局以煽動罪名起訴，慕尤丁涉嫌在吉里州的議席補選中發表煽動性言論，批評馬來西亞前國王在大選後沒有邀請他宣誓就任總理。一經定罪，他可被判3年監禁和罰款5千馬幣。然而，西方媒體只是對事件輕描淡寫，而英國外交部、政界、媒體以及歐盟對此也沒有置喙。

港英政府在1938年訂立《煽動

條例》，把針對英王的仇恨、蔑視和不屑言論等定為罪行，並於1971年納入《刑事罪行條例》，涵蓋作出煽動意圖的行為、發表或持有煽動刊物。

港英時期的煽動罪在回歸後一直保留至今，直至今年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相應的煽動罪條款取而代之。

港英政府在社會動亂時經常引用煽動罪。例如在1952年，一份報章的持有人和編輯因為報道政府處理東頭村寮屋大火的手法被控煽動叛亂。最終被告被判處入獄，報章被罰款和停刊12天。此後在1967年，三份本地報章的負責人被控發布針對警務人員的失實和煽動性新聞被判入獄3年，而報章也被勒令停辦半年。

定罪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的案件最近判決，裁定兩人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法庭的證供顯示，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間，兩名被告以「立場新聞」作發布平台發表11篇文章，意圖煽動憎恨中央及特區政府。有證據顯示，二人知悉文章的煽動意圖，但仍顧煽動後果發表文章。

主審法官郭偉健指出，「立場新聞」無理謾罵政府和攻擊香港國安法，意圖引起恐慌和煽動對抗，並為反華勢力所用，成為抹黑和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他指出，「立場新聞」支持「本土主義」及鼓吹「香港自主」。也就是說，「立場新聞」案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

然而，「立場新聞」案件的判決旋即招致西方政府和政客的肆意非議。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的煽動罪案件視而不見，不予置喙，唯獨對香港的煽動罪案件大做文章、肆意抹黑特區政府。譬如，英國反華組織「香港監察」贊助人、前「港督」彭定康聲稱，「立場新聞」案標誌着「新聞自由進一步墮落」。事實是，他就任「港督」時毫不在乎煽動罪，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去廢除煽動罪法例，現在只是藉此事抹黑特區政府。

美國是破壞「第四權」慣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太·米勒聲稱，「立場新聞」案的判決「損害了香港以開明見稱的國際聲譽」。米勒的言論可謂諷刺至極。事實上，美國才是破壞「第四權」的慣犯。譬如，美國多年來鏗而不捨地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為的只是懲治他揭露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古巴關塔那摩灣犯下的人道罪行。英國協助美國迫害阿桑奇，把他關押在倫敦一所監獄超過五年，彭定康也沒有就此提出抗議。實際上國際特赦組織在6月26日發表聲明指控美國「對新聞自由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

每當涉及中國話題，西方國家以及彭定康等反華勢力總會搬出另一套價值觀對中國評頭品足。他們的盟友引用煽動罪時，他們選擇視而不見；但當香港引用煽動罪時，他們就群起口誅筆伐。這種虛偽雙重標準讓人噁心。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律政司刑前事檢控專員

安老服務以人為本 改善「隱蔽長者」問題

知庫專欄

周嘉俊、林于正

在全球人口老化的背景下，隱蔽長者問題逐漸浮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四位長者中就有一位處於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 的狀態。據202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香港有約27萬名獨居長者，佔總長者人口的18.5%。其中不少屬於隱蔽長者，與社會聯繫微弱，未能被現有社區支援網絡辨識與提供支援。

香港社會服務聯合會去年發布的報告顯示，近四成的長者正經歷着社交孤立，一個月內接觸的親友數量少於兩人。長者的孤獨感會對生活滿意度和健康狀況構成負面影響，這不僅影響長者的生活質量，還可能導致醫療開支增加，給社會帶來沉重經濟負擔。更嚴重的是，一些原本僅面臨輕微健康問題的長者，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所需的支持，身體狀況可能會急劇惡化。

社交孤立形成惡性循環

不少香港長者因健康問題接受醫療服務，才進入社區照顧系統，但此模式難以應對隱蔽長者問題。去年一份研究指出，導致長者社交孤立的因素往往比身體健康問題更早出現，甚至與身體健康無關，當中因素包括經濟條件、配偶離世以及退休後社交圈縮窄。

在身體出現健康問題時才接受治療，充其量是亡羊補牢之舉，並不能對症下藥。在現行的醫療及社區照顧系統中，長者往往被視為被動的服務使用者，他們一旦進入醫療系統，或需長期接受治療。研究顯示，香港近25%的長者再入院屬於非計劃性，而當中約兩成是不可避免的。雖然醫療服務致力於幫助他們維持基本生活能力，但正因為要頻繁進出醫院，他們難有閒暇在社區層面追求充實的生活。即便身處社區，許多長者實際上並未融入其中，日常生活更多變成了在各種社福和醫療機構間穿梭，與親朋好友相處時間減少。即使香港擁有令人羨慕的預期壽命，長者的幸福感卻並未同步提升，甚至呈現出下滑趨勢。

此外，當社交活動可能對健康構成威脅時，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部分人建議長者搬遷到遠離人群密集的社區環境，有關建議導致長者更加減少外出，進一步減低社交生活。這不僅加深社會將長者視為被動、不活躍群體的負面印象，也形成了一個持續的惡性循環。

其實，香港現時並非沒有針對隱蔽長者而設的服務，但受人手和資源限制，難以持續跟進每個個案和全面滿足他們的服務需求。因此，香港需要從根源着手，改變社會對長者的負面印象，將他們視為寶貴的「資源」而非「成本」。

「時間銀行」做法值得借鑒

事實上，由政府推動的「長者學苑」計劃和社福機構營運的「時間銀行」都是值得參考的成功例子。這些計劃促進了他們與其他年齡層之間的社交互動，拓寬他們的社交圈子，進而增強了對社區的歸屬感。由於這類計劃在香港尚未普及，政府應加大支持力度，協助社區發揮創意，為長者創造更多貢獻社區的機會。

在現行的安老服務上，服務提供者亦可考慮讓長者有更多機會參與服務設計與活動規劃的決策流程。社區中曾有創新的項目由長者擔任主導的角色，從構思到策劃，再到推行，均由長者作出決策，最終成功製作微電影和繪本。政府及社福機構需好好總結這些先行計劃的經驗，並考慮將長者參與程度列為項目評估的指標。這樣可以有效確保長者的聲音獲得重視，而項目亦能更貼近長者的需要。

只有當思維轉變為實際行動，香港才能有效推行「以人為本」的長者照顧模式。這種模式不僅關注長者的身體健康，更將他們心理、情緒及精神層面的福祉置於重要位置，扭轉社會對長者的刻板印象，從根源應對隱蔽長者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以元首外交引領中英關係邁向新台階



中英關係 楊凡欣

2024年8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英國首相斯塔默通電話。斯塔默在首次與習近平主席通電話時表示，他希望中英兩國發展更緊密經貿關係，同時能夠坦率討論彼此間的分歧。這是近兩年中英關係處於冰封狀態下，兩國高層領導以長遠和戰略眼光看待兩國關係，「秉持夥伴定位」，主動對話交流。希冀構建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以造福兩國和世界。

一、穩定互惠的關係符合中英兩國根本利益

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的西方國家之一。20世紀70年代，在國際形勢變化的大背景下，中英實現正式建交，並以此為起點，開啟經貿、文化等領域的密切往來與合作。1997年香港回歸為中英關係的進一步順暢發展鋪平了道路，1998年中英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04年深化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5年確認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近些年，兩國在貿易投

資、新能源、數字經濟、金融服務、文化體育、教育，以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共同處理地區熱點問題等領域開展廣泛的合作。

但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中英關係亦起伏不斷。究其原因，其一，美國主導下的所謂中美戰略競爭、英國脫歐泥潭、俄烏衝突等重大事件影響中英關係走向。其二，各屆英國政府上台後的對華政策多變，如高敦政府、卡梅倫政府的務實對華政策，文翠珊政府、約翰遜政府受國內外各種因素影響「全球英國」框架內的對華政策，而蘇納克政府執政期間，更為配合美國的反華戰略，對華政策強硬，甚至曾計劃派遣航母前往亞太地區。其三，英方時常就人權、香港事務等對中國說三道四，干涉中國內政，影響兩國的正常交流與合作。

從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上看，英國具有獨特的戰略優勢和地位，理應保持獨立的戰略自主性。中英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構建穩定互惠的關係，加強溝通和協作，不僅符合雙方根本利益和長遠發展，也有助於為維護世界安全與穩定作出貢獻。中英之間應在

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聚焦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兩國關係重回健康、穩定、互惠、發展的軌道。

二、元首外交與高層互動折射中英關係變化指向

自香港回歸至2018年，中英高層領導人總體保持了高頻率的對話和互訪，2015年中英夥伴關係更是達到「黃金時期」。2015年3月，英國威廉王子帶著女王寫給習近平主席的邀請信訪華，當月英國宣布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中英簽署政府間和非商業協議13項、商業協議28項，涉及金融貿易、能源、科教文衛等多個領域。雙方發表《中英關於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開啟了中英關係的新篇章。

然而，2019年至今，兩國領導人未再見面，折射出中英關係變化指向。自中英建交70多年來，幾代「破冰者」見證並積極參與中國發展和改革事業，推動在互利合作中實現自身發展壯大。當下，世界面臨多重挑戰交織，疊加全球經濟發展低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衝破保護主義和陳

舊思維的「堅冰」，更需要傳承「破冰精神」，以元首外交為引領，以中國新時代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的良好契機，推動中英關係邁向新發展，既堅定不移地發展自身，又能敞開胸懷造福世界。

三、高度契合和優勢互補產業為各自發展振興注入強勁動力

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助中英開闢「前景廣闊」合作，包括人文教育、新能源、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生物醫藥、數字經濟、金融等領域，具有廣泛合作潛力，能夠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英國是現代高等教育起步和發展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至今，英國高等教育仍以其特有的質量管理和治理模式在歐洲乃至世界享有盛名。英國政府將發展高等教育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大舉措，視高等教育為知識經濟背景下的高端產業，在國家層面上將高等教育作為高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化是英國高校持續引領世界高等教育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當下，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熱度未減，因為中美關係跌入低點，美國高校學費增加，美國大選等多層因素影響，很多學生不再把美國當成第一選擇，到英國等留學的受

歡迎程度顯著上升。中英兩國在高等教育有廣泛的合作，無論是高校之間的合作辦學還是科研合作，或是中國學生赴英留學，都是英國高等教育實現發展振興，並釋美國高等教育衝擊的良好契機。

同時，中英新能源等綠色技術合作未來可期。中國正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大力推進綠色發展。中國新能產汽車產銷量穩居全球第一，保有量佔世界一半以上。非化石能源裝機佔比提高至54.6%，供應全球近60%的風電和80%的光伏設備。這為中國對外開展包括同英國的相關合作，帶來了巨大機遇。中國新能產車企走向英國市場，反映了雙方供需的互補性。中英在綠色技術合作及產業鏈投資方面亦是需求互補、合作潛力巨大，兩國在氫能、漂浮式海上風電等新技術領域研發合作也大有可為。雙方應抓住契機，深化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製造等領域政策協同、標準融合、技術合作，共同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開展更多務實合作，助力兩國構建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並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論壇部主管